

「創作的新腦袋」

「佔領」與「後佔領」運動給我帶來了深刻反省的機會及心理、思維調適的需要。今日的領導，誰也不在乎誰多有權勢、地位、經濟動力、土地擁有或英雄事蹟。即使談理念，站道德高原的意見領袖，除了回歸學院之餘，連昔日的講話平台都消失殆盡。社會陷入一種領導危機：資訊廣泛流通，集體爭論，場合選擇領袖，參與者就是決策人，誰也代表不了誰；政府或哪一個黨與派都在鬧分裂，凭他在官商民望中曾居怎樣卓越崇高的地位，到如今都像酒會過後的狼藉。擂台上，敗的固然敗了，勝的也不知該怎樣收拾這殘局。這場管治與被管治間的拚搏，到底情歸何處？我們的社會需要的是一種怎樣的文化？是否單靠我們的服務需要、經濟繁榮，社會就會和諧？我們應跟誰合作？可以怎樣溝通和繼續關顧弱小？無證兒童是否弱小者？在價值觀方面，我們意見分歧；在釐定及實踐目標方面，我們沒有共識。

一句空洞的口號，不會因為多些人吶喊多幾次，便成了具有實質的意義；同樣，公義與命運自主，豈能憑對抗或推卸責任而達致？怎樣才能實現建設性的交談及人與人之間互相聯繫的文化？我們不得不承認，今日盤踞在各種管治舞台的領袖，大都韶華老逝。猶如對待您家中年青的一代，想與他們交談共處，您先要懂得謙卑學習，不是不得已，而是積極的、從不同的角度欣賞和尊重他們。演出的「台規」正在改變，不管您喜歡不喜歡，您還得配合，假如您想和您的青年一代繼續「合演」下去的話；畢竟大家說的雖是制度，卻也不能抹煞其中何嘗不關社會的民生與福祉？

新創作需要新腦袋，我若要我的孩子每日自動自覺的做功課、學習，豈能純靠獎勵、打壓、恐嚇或嚴密監察？必須從單向思維轉變為多向思維；除了認識固有的認知結構、導入新資據、環境的新印象及行為的新動機外，應考慮如何促成及加強思維的調整？我是否願意推翻自己的一貫結論？面對挫敗，我是否仍能懷有希望？對異見我能包容、開放多少？我可曾真誠聆聽使自己難堪的批評？我願意及能夠修改已訂定的方法、程序、所作出的判斷嗎？成敗的判斷原來並不一定取決於科學、理念、科技、武力，甚或大多數人的意見，而是關乎人一己的視野與胸襟。讓我們熱切追求一個可以承受新創作光芒的腦袋！

+ 楊鳴章主教
二〇一五年耶穌聖心節